

# 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建构路径分析

赵春丽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逐步确立了世界范围内的学术话语权。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一家独大，西方国家更加注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构学术话语权，产生了一套精密的学术话语生产和运作机制。西方建构学术话语权的途径具体包括：西方学者研究视野遍及全球，掌握了解释现实的学术话语先机；不断提出新的方法与建构核心概念，注重学术话语生产和理论更新；以学术话语贯彻国家战略意图和意识形态目的；通常由专家领衔或智库运作，重视学术话语的系统化运作；学术机构与媒体紧密配合，高度重视学术话语传播等。学术话语权事关意识形态安全，深入剖析西方建构学术话语权的途径，对我们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科学 学术话语权 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简介：**赵春丽（1982-），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48）。

##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话语权一方面体现为“权利”即资格，指拥有学术的“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和学术自主权”<sup>①</sup>；另一方面体现为“权力”即影响力，表现为“引领学术发展的趋向、决定学术议题的设置、左右学术评判的尺度、主导学术交流的势态等诸多方面”<sup>②</sup>。近代以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飞速发展，主导了世界的学术生产、学术研究的前沿方向、资源平台和评价标准，在学术自主、学术创新和学术影响力等方面，逐步在世界范围确立了学术话语权。西方学术话语权的确立既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的历史进程，也是西方国家基于现实发展和国际意识形态竞争需要而主动作为、积极建构的结果。学术话语具有建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sup>③</sup>。西方学术话语建构了自由民主的政治认同，确立了多党执政、选举民主的政治合法性，不仅形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也因其在世界范围的学术话语主导权而深刻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价值判断和政治道路选择，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治认同的学理基础，冲击着发展中国家基于本民族特色而选择政治道路的自主性和自信心。可以说，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事关政治道路、政治制度认同，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当前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

① 郑杭生：《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② 沈壮海：《试论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第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与全球治理并承担国际义务,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却经常被西方主流舆论质疑,疑虑和误读、傲慢和偏见乃至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未曾消弭,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诸多困扰。因此,增强国际话语权是当前对外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国际话语权的根基是学术话语权,习近平指出:“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sup>①</sup>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取得较大发展。然而,在西方学术话语权的强势影响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总体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渗透于各个学科,学术研究领域的“西化”现象比较严重,学术自主性还很不足。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第三世界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制度和理论依赖,导致了“被束缚的心灵”,即一种不批判和模仿西方思想和概念的心灵<sup>②</sup>。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话语自主创新,也不利于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我国学术界,一些领域盲目追随西方理论、照搬西方学术范式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构成深刻的学理挑战,影响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认同和未来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从而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意义十分重大。西方学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学术话语生产机制,打造了完备的“知识生产流水线”与“加工厂”,形成了以智库为主导的竞争市场,以全媒体为特征的知识传播格局,建构了一整套国际政治经济话语体系,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概念、理论、范畴和表述,设置了诸多国际议题,这些做法大大强化了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影响力。通过考察西方如何建构学术话语权,对于我们提升学术话语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二、西方学术话语权建构的基本路径

### 1. 研究视野遍及全球,掌握解释现实的学术话语先机

西方学者研究视野开阔,研究对象不仅包括自身,也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非西方国家,掌握了以学术视角观察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动态的第一手资料。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均不局限于自身,诸多研究都涉及世界范围内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这是确立世界范围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从研究对象来看,西方学者的视野不局限于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而是包括众多的非西方国家。相比较而言,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则是更多地局限于自我的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非西方世界逐步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样,非西方世界也很早被纳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为西方学术理论取得“普遍性”意义也即学术话语的“权威性”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如果以研究视野来评述的话,西方的学术实际上是将全世界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而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则仅仅是地方的研究。所以,当西方标榜其话语普遍性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有丰富的经验研究和开阔的研究视野内涵其中的。”<sup>③</sup>以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为例,西方政治学不仅研究自身的自由民主制度,也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民主转型等纳入研究视野之中,并在事实上塑造了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的“政治转型”“民主化”“民主巩固”等话语。不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如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等都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考察了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美国学者阿伦·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② Syed Farid Alatas, “On the Indigeniz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Alternative*, Vol. 18, No. 3, 1993.

③ 张连海:《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学术话语权发展路径的转换》,《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利普哈特的《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则考察了1945-1996年期间的多达36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以期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以及新兴民主国家提供参考。再如《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是由美国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两位作者历时五年对五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的研究，理论视角开阔，开创了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学科领域，具有世界性影响。西方学者与相关机构制定的各种评估体系、测量指数与排行榜，也以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为对象，如清廉指数与行贿指数、民主与治理评估、全球自由评估与地方转型评估等，这就等于用自己的尺度为世界各国发展确立标准与规范。

进一步来看，从知识生产过程来说，西方学者首先掌握了解释现实的话语先机。从一般的认知规律来看，第一个“发声”的人往往占据话语先机。西方学者较早就开始了对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观察和实地研究，形成研究论文、著作或报告，建立了研究论题和规范。而非西方学者要想知道其他国家的实际状况或研究动态，只能从阅读西方文献开始。另外，西方社会科学界较早开创了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规范化研究，各种学科概念、理论框架、研究范式、测量指数与评估等均起步早，方法相对规范，因而容易取得普遍认同。这种学术研究的先机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西方学者成为知识最初的生产者、话语表述者，成为学术话语“权威”，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被非西方学者“跟着说”“比着说”，构成一种“标准”、一种“参照”、一种主导的“思想”，于是，西方学者的思想、理论著述与方法就会转化为非西方学者的思想与方法。这就是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 2. 持续创新方法与建构核心概念，注重学术话语生产和学术理论更新

20世纪初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社会科学学者从过去的直观经验、猜想和思辨中走出来，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意识增强，开始运用数量分析和定量统计、实验比较等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的学科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如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解释学）、批判主义、后现代主义方法和分析范式。20世纪后半叶以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更多采用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方法，并逐渐成为主流。自然科学的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生态学、耗散结构理论等也不断运用到社会科学中来。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发展，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计算社会科学、各种算法正在影响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方法上的“自觉”、不断的持续“创新”，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的持续引进，不仅推动了西方学术的繁荣，使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也在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中确立了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上的话语权。

在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的基础上，西方学者善于凝练核心概念、建构理论。概念凝练和理论建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知识创造的基础。西方学术界善于创造各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概念和理论，具有很强的概念创造和学术话语生产能力，主导国际哲学社会科学前沿和发展方向。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战略领域，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华盛顿共识、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等都是具有全球关注度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政府失灵以及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市场经济等都是经济学界流行的术语；在政治学领域，西方学者通过对民主概念的逐步改造、理论升级，将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牢牢把握了自由民主的话语权<sup>①</sup>。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等核心概念不仅是西方政治学界的关键范畴，也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学界研究的理论范式。西方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新闻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术前沿往往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学界研究的热点。

西方学者的概念凝练与理论建构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度凝练，简明、扼要，用最简洁的概

<sup>①</sup> 参见曾毅、杨光斌：《西方如何建构民主话语权——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解析》，《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2期。



念或短语表达核心的思想理论，易于传播，比如“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修昔底德陷阱”等。二是尽量通俗形象生动，比如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被形象地称为“休克疗法”。对“权力”的研究，则用“硬（hard）”和“软（soft）”、“巧（smart）”和“锐（sharp）”等来定义，甚至借用信息技术中的技术升级版本来定义，如“权力3.0（Power 3.0）”。三是注重经验观察，精心建构“普遍性”理论。经验观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研究的基础，西方学者注重在经验观察和实践调研基础上去建构理论，强调自己理论的“普遍性”。四是注重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更新，注重学术研究的连贯性。西方学科分类和学院化的客观结果是学术概念和理论“片面的深刻性”以及完整的知识谱系。西方学者会根据现实的发展不断补充、完善甚至修正理论，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以他的“软实力”闻名，他把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巧实力”；西方学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高等教育教材往往一版再版。

### 3. 以学术话语遮蔽意识形态目的，引领或配合国家战略

以学术话语包装主流意识形态，为意识形态披上学术的外衣，用学术话语掩盖战略意图是近年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鲜明特点。学术话语权不仅是学术发展水平的标志，也关系到国家话语权，牵涉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战略紧密相关。然而，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却有意遮蔽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将社会科学视为纯科学，这种以价值中立预设的“社会科学”助推了西方学术话语权。然而，学术话语作为知识的创造，不可能脱离国家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sup>①</sup>西方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存在紧密关联，具有高度一致性，而很多人经常疏忽了西方学术话语权建构的这一特点。

事实上，不仅“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sup>②</sup>，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社会科学家亦是其学术代表。回顾近代历史，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以及“法治”的话语体系，均来自于启蒙运动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家的思想成果，这些成果解放了人的思想，为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塑造了资本主义世界影响至今的话语体系，并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曾批判小资产者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sup>③</sup>同样，资产阶级的著作界代表与其关系也是如此。今天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不再为夺取政权服务，但却在为资产阶级统治寻求合法合理的学术外衣，资本主义的学术话语建构了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堡垒，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将西方意识形态学术化、社会科学化，并作为课程融入学校政治和社会通识课程中。然而，西方学界和媒体却宣扬西方无意识形态教育的假象。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法学都具有一种与现实物化结构相适应的合理化特质，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方式是物化结构与物化意识的理论反映，“法律产生的真实基础，各阶级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变得模糊起来，并消失在研究它的各个科学中”<sup>④</sup>。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试图将这种情况上升为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人类社会生存的一般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8页。

④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5页。

形式，宣称历史终结了。学术话语是对现实的总结和提炼，同样的经验和材料，由于研究者具有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后，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运行背后的深刻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却得出资本主义制度永存、“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

“夺取政权的舆论先导和维持政权的统治思想营造，是哲学的两大意识形态功能。”<sup>①</sup>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以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为手段，以占据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为抓手，赋予自己援助、渗透、战争、入侵乃至颠覆别国政权等对外行为以道德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往往首先来自基于利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的“学术论证”。近期，美国学界提出的“锐实力”，指中、俄等国使用审查、施压、威胁甚至金钱收买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这是主动配合国家政治战略、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论证”，以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为目的。西方学界所颁布的衡量一国民主自由度的“制度指数”，如“自由之家”<sup>②</sup>“政体四”<sup>③</sup>、经济学人“民主指数”<sup>④</sup>等，都宣称是基于特定理论和制度标准而计算出来的所谓“客观指数”，这些排名往往与对象国的主观感受相去甚远。基于这些指数而形成的各种研究，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意识形态<sup>⑤</sup>，配合着美国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世价值与民主输出战略。这些以学术面貌包装、以数学公式计算的测量指数、自由主义理论与制度设计等，非常具有隐蔽性、迷惑性，给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政治转型带来很多负面的乃至灾难性的后果。

#### 4. 知名专家领衔或智库主导，重视学术话语的系统化运作

西方学术机构往往重视学术话语的运作，学术概念或理论提出来以后并不意味着学术话语的结束，而是学术话语的开始。它们重视话语运作，以期产生较长时间的话语影响力，影响政府决策，实现学术话语落地。这一过程往往由知名专家领衔或由智库运作。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诞生于20世纪初，但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智库迅速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等公共政策领域发挥突出作用，很多知名智库引领了各国的思想讨论和国际舆论动态，主导着国家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对西方学术话语权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是世界上智库研究能力最强的智库大国，拥有著名的智库如布鲁斯金学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学会、胡佛研究所等。这些智库往往游走于学术界、政界和大学机构之间，与政府部门、基金会、大学、政党等机构保持联系。智库研究力量强大，向政府、社会和相关组织机构、利益集团兜售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智库产业”，建构了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和思想的竞争市场，影响国家和社会公共政策。智库是政府话语的“诠释者”“风向标”“试探器”，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掌握强大的话语权，甚至被称为第四权力部门、影子政府<sup>⑥</sup>。近期西方学界提出“锐实力”和“权力3.0”等概念的过程中，直接运作的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该机构联合了多家智库机构开展联合调研，做出研究报告，然后进行报告发布和研讨。从概念的提出、报告的完成，到主流期刊、电视台、网络新媒体的发布，再到专家访谈、写专栏，以及利用早餐会、晚餐会、研讨会、国会听证会、公众演讲等进行全方位的推广，环环相扣，不断扩大影响力，成为学界和媒体追捧的新名词。

智库通常拥有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往往拥有丰富的学界与政界双重履历。西方国家普遍存在

① 侯惠勤：《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② 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创建的年度“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自由民主评价体系。

③ 美国马里兰大学罗伯特·科尔教授创立的“政体四”项目指数。

④ 《经济学人》智库创建的“EIU Democracy Index”民主指数。

⑤ 参见杨光斌、释启鹏：《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自由民主评价体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

⑥ 参见张焕萍：《兴盛与挑战：美国话语权研究》，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第165-166页。

学界与政界人才交流的“旋转门”，即智库、学界输送学者到政府任职和政府人员离任后到高校、智库等学术机构任职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之间的交流和旋转。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曾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顾问，推行其“第三条道路”的政策设想；基辛格曾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关系专家，后到政界任职；布热津斯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后来曾担任卡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教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不仅提出了“软实力”理论，也是“锐实力”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一方面，这些学者以其卓越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获得政界的认可；另一方面，其政府任职行为又进一步推动实践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通过“旋转门”，掌握大量专业知识的智库学者成功地将他们的思想、理念与知识转化为“权力”，知识与权力一旦紧密结合，就会产生更加广泛的、现实的影响力，形成话语权威。“旋转门”机制使得优秀的学术人才得到重用、学术思想得以为政府所接纳和实践，也能对社会和公众施加舆论影响力。这就加强了学术话语的影响力，促进了相关学术思想和政策主张的落地，提升了学术话语权。

### 5. 学界与媒体协同配合，大力推动主流学术话语传播

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的紧密配合、联合协同是西方学术话语权建构中的重要环节。西方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建立世界市场的进程，也是其思想产品向世界扩散和传播的过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sup>①</sup>包括学术思想在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随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强大的军事、科技和媒介力量传播到世界各地。学术媒体和主流媒体对西方主流学术话语的媒介支持和有效传播，助推了西方学术话语权的确立。

一方面，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以学术期刊为代表的西方学术媒体起步很早，在出版机制、体制等方面都比较健全，国际化程度高，较早建立了期刊的分级评价体制。这种评价体系不仅主导了西方学术界，还不断渗透和主导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的评价。以西方社会科学界 SSCI 为例，SSCI 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期刊检索与论文参考渠道。仔细研究被收录的 3000 多种社会科学期刊，仅有 11 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期刊被收录<sup>②</sup>。这些期刊中并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期刊，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期刊也不可能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收录。此外，SSCI 本是期刊评价体系，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指挥棒”，成为不少高校职称晋升与能力评价的标准。西方学术评价的宰制不仅被一些学者批判为“学术殖民”，而且已经造成大量优质的研究成果外流，“学术标准外移，逐步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把评价学术成果的尺子交给了国外几大引文数据库”<sup>③</sup>，这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如上文所述，社会科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这种现状不仅影响我国的学术自主性，更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未来道路走向。

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到拥有强大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在西方学术话语权建构中也起到了独特作用。西方媒体全面掌控国际舆论导向，拥有强大的议题设置和话语传播能力，架设了通往全球各地的传播网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尤其强调对媒介话语权的掌控，这在美苏冷战中起了巨大作用。冷战结束后，在美国，新闻媒介高度垄断，在大资本运作下，媒体与政治形成相互“绑架”的共生关系，“完美”契合和传播了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在阿富汗、伊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4 页。

② 参见《SSCI 收录中国的期刊》，<http://ldlu.dlu.edu.cn/Item/5589.aspx>。

③ 李正元：《优质学术资源外流 削弱国家软实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 5 月 19 日。



克、利比亚、叙利亚战争中，在中东欧、西亚北非等“颜色革命”中都看到了西方媒体操控舆论、主导话语权的现象。西方媒体并不是现有权力机构的挑战者，相反，它高度依赖于现有社会架构，扮演着权力依附者角色。美国主流新闻界有着强烈的经济立场以及“政治正确”底线，强调资本主义、利润主导、自由市场，那些和所谓“美国价值”不相符的故事，往往被抛进废纸篓或者电脑回收站。而在报道外国事务时，更习惯采用“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只有像美国这样的政治架构才是自由的”等视角<sup>①</sup>。可见，西方学术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媒体的“政治正确”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西方主流媒体通常排斥、打压马克思主义等非西方主流学术话语的传播，不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留下太多媒体空间。在美国，马克思的学术观点虽可以被研究，但“马克思主义”却不被接受和认可，被认为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难以登上美国主流杂志和主流大众传播媒体，我们很难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报道中看到马克思主义立场倾向的专家参与节目访谈，也很难在《经济学家》《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主流报刊看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的媒体报道。而对于上文提到的“锐实力”“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学术观点，不管是电视、报刊还是主流网站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传播。西方主流媒体进行传播的学术话语是有选择的、符合其主流价值观的。

西方学界深谙媒体的力量，没有媒体的力量，学术话语难以广泛而有效地传播，西方主流媒体的专栏文章几乎为智库专家所垄断。智库等学术机构需要借助媒体的作用来引起政府或公众对公共问题与政策的关注和重视，从而体现自己的研究价值。上文提到的“锐实力”，在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经济学家》杂志刊登，进而在知名时政类网站刊登知名评论文章进行呼应，《外交事务》杂志、布赖特巴特（Breitbart）、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等网站与博客纷纷对“锐实力”跟进报道，不断扩大影响力。除了主流纸媒、电视媒体，近年来，西方智库、高校等研究机构更加注重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来传播自己的研究报告、学术观点，各类学术博客、播客、社交网站均成为他们传播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的平台。由此，建构了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新媒体、从学术期刊到大众媒体、从课堂到论坛、从学术机构到非政府组织推广等在内的立体化传播架构。自由民主价值观及其制度模式由学术研究转变为“民主营销”，打着“民主”的品牌来促销“新自由主义”和“休克疗法”<sup>②</sup>。可见，媒体助推了西方学术思想、学术理念等话语的传播，而没有学术的支撑，媒体可能缺乏说服力；学术观点、价值理念等以多样的媒介化形态呈现和传播，学术和媒体互相裹挟、互相借力，牢牢掌握着国际话语权。

### 三、对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启示

#### 1. 扩大研究视野，树立话语先机意识

在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过程中，我们的学术视野还需要更加开阔，基于国际视野的理论建构能力还有待加强，需要创立和完善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理论。

第一，要注意扩大研究视野，用中国的视角与立场研究世界各国，以中国话语解释世界。一方面，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们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等诸领域进行实地调查、深入研究，而不是把西方

<sup>①</sup> 参见王学锋：《新闻暗规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2-143页。

<sup>②</sup> 参见〔美〕杰拉尔德·瑟斯曼：《西方如何“营销”民主》，忠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69页。

的研究结果直接拿来用；要进行田野调查，做出实际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学者自当担负起这样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通过对别国的研究以镜鉴自身发展，更好地认识和反省自己，以更宽广的视野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道路；以比较视野研究他国经验和中国经验，注意学术研究的普遍性，平衡中国视角与世界视野的关系，“在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中国经验的独特与复杂并不是也不能成为拒绝将中国经验与现象拿来与别国进行对比研究的借口和理由”<sup>①</sup>。

第二，要有话语先机意识，及时建构理论，主动解释当代中国。中国人要学会向世界解释自己，提升自己的话语阐释能力。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现象是：对中国的权威解释经常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随后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以“中国模式”为例（又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此概念是由英国人乔舒亚·雷默率先提出的，此后传到国内，一度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热点。由于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视角独特、理论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往往具有先发优势，成为被效仿、被追随的范式。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很注意把握时机，占领了在国际学术视野中研究和解释中国的话语先机，因此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议题和方法基本由西方学者提出。这种状况导致了我们在向世界阐释自己时似乎总是慢人一步，我们亟需改变这种状况。

## 2. 强化问题意识，注重核心概念的凝练和理论的持续创新

在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过程中，作为后发展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是现代化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学术上也是如此。但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逐步跳出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的固定思维范式，有自己的文化自觉，有自己的问题意识。

第一，要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增强提出问题的学术自主性。中国学者要跳出从西方文献、从西方理论找问题的研究范式，真正建立中国视角的问题意识、分析范式、话语凝练、理论归纳等知识话语体系。不是从西方概念和理论出发，因为无论是“冲击—回应”抑或“中国中心观”都是从西方理论预设出发的研究，要改变西方理论与现实颠倒的关系，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经验和世界问题，提升知识话语生产能力。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善于提炼标志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按照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标准，你是不可能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研究对象的”<sup>②</sup>。同理，按照西方学术标准，我们也无法理解自身，如果我们的学术都无法认清和表达自我，无法向世界说明自我，谈何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

第二，要不断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增强凝练学术概念的能力，提出经得起推敲、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迄今为止，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巨大成功，还没有学者能够提炼出足够吸引人的学术话语，学术界还未能成功描述中国成功的“秘密”。中国学者需要从思想理论和制度建构等层面讲好中国故事。无论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发展还是从中国大国形象的建构来看，中国不能依赖于西方世界来讲述自身故事，要加大以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力度。比如，按照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解释，一党执政是无法保证政府有效回应民意的，没有大规模普选也难以产生负责任的民主政府，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已经打破了西方关于政党轮流执政、选举即民主的理论迷思，中国共产党正在实践并形成独特的执政规律。当前，我们应该进一步反思西方学术范式的局限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问题，

① 陈家刚：《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国经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

② 马拥军：《如何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大胆进行理论建构。

第三，注重研究方法上的自觉和理论的持续创新。所谓“文化自觉”，不仅是内容上的自觉，还包括方法上的自觉，要“致力于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sup>①</sup>。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虽有其科学性，但是西方理论也不宜被简化为普世皆可用的分析范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应该看到，一大批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引进和借鉴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了本土经验的独特性，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普遍存在“理论过剩，经验匮乏”<sup>②</sup>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已经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不仅失灵，在中国的情境中也不科学。一些学者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学术问题、研究方法、分析模型直接应用到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研究方面，不仅无法有效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也难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本身更是无法理解。中国经验要凝练出来并上升为中国理论，是否需要一个范式革命，值得研究。

### 3. 正确处理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关系，用学术话语讲好政治叙事

在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过程中，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意忽略学术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关联，刻意与政治话语保持界限，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非学术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歧视，追求所谓价值中立的研究。价值中立的研究由于价值立场的“虚无主义”，导致一些研究或简单跟着“西风”跑，成为西式学术话语在中国传播的“带路人”；或“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为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服务，自然也难以确立其话语权。“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sup>③</sup>在建构学术话语权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学术研究要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学术和现实、学术和时代的关系。“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sup>④</sup>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与时代同步，学术话语不能脱离宏观政治话语所指向的国家发展大趋势、大方向、大格局，而必须保持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服务于时代和国家发展大战略。学术话语还要通过前瞻性的研究，为政治话语提供借鉴参考，为国家决策和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撑。用学术话语阐释好、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与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运行规律与优势、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与优势等，提炼出新中国70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政治与文化变迁的学术理论。

第二，要用学术话语讲好政治叙事。西方学术话语以科学性、规范性和价值中立的预设巧妙遮蔽了意识形态和战略意图，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形象建构。“一个国家价值观的建构、宣传和认同，需要学术思想作为理论背景，其政治话语需要学术话语体系来阐释、表达和传播，而学术话语则需要政治话语的引导。”<sup>⑤</sup>要通过彻底的学术研究为政治话语提供理论基石，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故事、中国共产党执政故事、中国制度故事、中国民主治理故事等。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通过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学术话语原创力，向国际社会阐释好中国特

① 费孝通：《反思 对话 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② 刘毅青：《如何建构中国的理论——西方汉学家的思考与启示》，《哲学研究》2014年第11期。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④ 《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人民日报》2019年3月5日。

⑤ 张胜利：《政治话语文风转变视角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构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7期。

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学术话语权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基，面对西方由学术话语承载意识形态目的的现实，我们必须以充分的理论创新和扎实的学术研究予以回应，从概念、范畴到论证、结论，一一予以回应。

#### 4.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智库，着力培养学术大家

从西方近期流行的学术概念来看，强大的学术话语权需要高水平的智库、学术团队和知名专家的支撑。在提升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智库建设，培养学术大师，畅通专家和智库之间沟通协作的通道和机制。

第一，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智库、高校智库，激活智库发展活力。根据2018年最新智库研究报告，从数量排名看，中国的智库排名靠前，但公共政策和学术影响力较低。数量上中国智库位列全球第三，第一名为美国，共1872家，第二名为印度，共509家，第三名为中国，共507家。从影响力来看，智库排名前100名当中，中国的智库只占7名。智库排名前20名之中，美国的智库占了一半，中国没有智库入选前20名位次<sup>①</sup>。这些排行榜未必客观准确，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智库的话语权不足，其影响力与国家的综合实力、国家的现实影响力不相符合。我们要组建多元交叉、多学科背景、跨界交融的智库研究团队，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领域的协同研究和创新；还要创新智库人才体制，广泛吸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优秀的专家学者进入智库从事研究，产生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更要创新智库运作机制，提升智库和研究机构的话语运作能力，充分疏通政府、媒体和公众参与的渠道，及时地使智库成果落地，使其持续不断地产生话语影响力。

第二，要重视民间智库和民间学术力量在学术话语权建构中的作用，积极引领和扶持一批优秀民间智库的发展。西方的民间智库机制灵活，游走于政府、学术和市场之间，与社会、市场联系紧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不同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其观点可能更具有前沿性、创新性。由于其可以站在第三方立场研究相关学术问题、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与官方智库相比，更具有对外学术话语传播与交往的灵活性，有益于观测国际舆论与国家战略的国际反馈。

第三，着力培养学术大师，建立各类学术人才灵活的流动机制。当前，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境况，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很少。要着力培养能够引领学术方向、具有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并能够有力有效回应西方的各种霸权主义、普世价值等论调与攻击的学术大家。要转变教育观念，改善科研环境；要形成宽容的学术氛围，克服急功近利、“短、平、快”等学术研究风气；尤其是要大力推动学术评价体系的变革，治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学术乱象，给学者创造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同时，要建立学术人才在高校与智库机构之间自由流动的机制，鼓励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辞任后进入高校、智库机构工作，为学术研究奠定宽广的人才基础。

#### 5. 健全学术话语传播机制，积极推动“思想走出去”

在中国提升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之一便是学术话语传不开、影响力不够。中国一流学者的研究往往仅限于中文期刊，输出自己原创而富有影响力的概念和理论存在困难。习近平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sup>②</sup>在学术话语上同样如此，我们凝练的学术概念往往难以有

<sup>①</sup> James G. McGann,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6/](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6/), 2019-01-29. p61.

<sup>②</sup>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2页。

效传播，很难获得广泛认可。

第一，中国学术期刊与报纸等学术媒体要“走出去”与“立起来”并举。学术媒体要“走出去”，创办多语言学术期刊，大力提升学术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也拥有一流的科研成果，然而，由于最优秀的论文成果倾向于投向西方期刊获得“学术认可”，故而造成大量优秀学术成果外流。另外，要打造中国学术媒体的国际化传播平台，当前，学术成果的传播更多依赖于传统纸质媒体的期刊，而学术网络平台、学术博客、学术微博、学术微信公众号等学术新媒体的国际化传播能力较低。同时，学术期刊与报纸要“立起来”，因为简单“走出去”只会服从于西方学术规则和价值规范，只有建立中国自己的评价指标，才能把学术评价标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化主流报纸与期刊，增强学术图书、学术期刊与报纸的国际化水平。

第二，推动中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加大对中国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传播力度。主流媒体要加大对最新前沿成果和新锐学术观点的刊载、摘编和传播。创建一批集新闻传播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大型融媒体传播集团，推动时政新闻、学术概念和学术话语的全媒体传播。同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要利用自身力量创建一流的全媒体多语言的学术传播平台，让中国学术前沿和学术话语传播至更远更广的国际舞台。

第三，完善机制，激励学者走上国际论坛。当前，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机制建设日益加强，但以学者、期刊为重心的“思想走出去”机制建设却亟待完善<sup>①</sup>。要改变“唯论文”的评价考核机制，对于学者具有影响力的网络文章、海外主流报刊的文章都应给予肯定，并纳入考核和评价体系；参加海外论坛、接受海外媒体专访、在国际论坛做主旨演讲等也应视为相应的成果予以认可。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中国思想和理论走出去，使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在国际社会得到不断加强。

#### 参考文献：

- [1] 陶文昭：《论中国学术话语权提升的基本因素》，《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5期。
- [2] 罗卫东、许彬：《近20年来中国经济学思潮的变迁及其反思》，《财经论丛》2002年第4期。
- [3] 李慎明主编：《领导权与话语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4] 侯惠勤：《论资产阶级实行思想统治和价值渗透的方式》，《红旗文稿》2009年第8期。
- [5] 张国庆：《媒体话语权——美国媒体如何影响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 [6] 陈曙光：《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 [7] Richard Jackson, “Constructing Enemies: ‘Islamic Terrorism’ in Political and Academic Discours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ume 42, Issue 3, 2007.

(编辑：张 剑)

<sup>①</sup> 参见王文：《谈学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思想贡献与输出》，《对外传播》2019年第1期。